

1949年国、共军事战略及其得失述论

经盛鸿 张瑞娟

(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97)

摘要 :1949年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发生重大历史性转变与深远影响的年代。本文依据毛泽东的有关论述为指导,系统考察在这一年,国、共两党最高层基于当时的国内、国际形势,所分别制订的军事战略决策的主要内容与实施的过程、结果,总结了各方的得失成败。

关键词 :中国共产党;中国国民党;军事战略

中图分类号 :K26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4970(2005)02-0049-05

1949年是中国近现代史上发生重大历史转变的关键年代。

在1949年,中国共产党指挥的解放军攻占了几乎整个中国大陆,并于10月1日宣布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而南京国民政府及其军队退踞台湾。从此开始了长期隔台湾海峡对峙的局面。历史证明,形成1949年战果并奠定以后多年中国军政局面基础的最重要因素,是在这一年国共两党最高层不同的军事战略决策及其成败得失。

—

国共两党经过1946~1948年约3年时间的内战,至1949年年初,胜负大局已定。解放军于1949年4月胜利渡过长江,并以不可阻挡之势迅速南下,至1949年10月直逼两广。在这时,国民党实际统治区只剩下西南的川、康、滇、黔地区与东南的台湾。当时,国共两党的最高层都面临一个共同的问题:怎样确定今后的军事战略?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最高层,面对一片大好形势,其军事战略决策,是把其战略重点与军事进攻矛头集中指向大西南地区,尤其注重于消灭国民党在大陆最后一个重要军事集团——胡宗南军事集团,而把进攻台湾放在次要地位。

早在1949年5月23日,在中共军队渡过长江占领南京、杭州即将攻占上海之际,毛泽东在致各战略区军政负责人的电报中,就对此后解放军各部向全国各地进军的路线、地区与任务作了筹划与部署。他除确定彭德怀的第一野战军进军大西北,林彪的第四野战军从两湖地区“尾白崇禧退路向两广前进”外,以粟

裕指挥的第三野战军“应当迅速准备提早入闽,争取在两个月内占领福州、泉州、漳州及其他要点,并相机夺取厦门”,而由刘伯承、邓小平指挥的第二野战军的任务则是协同三野渡过长江,然后“应准备于两个月后以主力或以全军向西进军,经营川、黔、康。”^[1]从此电文中可以看出,毛泽东这时对福建,主要考虑的是占领福州、泉州、漳州等要点及厦门,尚未提及金门,更未提及澎湖与台湾,而对西南,则十分重视与防范国民党可能“建都重庆、割据西南”局面的出现,部署各部对胡宗南等“川康诸敌”实行大迂回、大包围;“从南面进军断其退路”。在毛泽东当时的军事战略计划中,台湾与西南孰轻孰重,是十分显然的。

此后,中共的军事战略则是完全按照毛泽东上述电文的内容制订与实施。

首先,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最高层把实施大迂回、大包围的军事手段,围歼两广与西南地区的国民党各军,进而占领这一广大地区,作为1949年最重要的军事目标与战略重点,为此制订了极周密的计划,采取了一系列的军事、政治、经济与情报、策反等措施。

一方面,毛泽东指示在1949年5月下旬占领西安与关中地区的彭德怀“一野”部队,暂时不去进攻退守陕南汉中的胡宗南部。1949年6月27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说:“国民党中央政府正准备从广州迁往重庆,为使伪府放心迁往重庆,而不迁往台湾,以及使胡(宗南)匪不致早日入川起见,你们暂时似不宜去占汉中,让汉中留在胡匪手里几个月似较有利。”^[2]1949年10月,当刘伯承、邓小平率二野大军从华东向西南进军时,毛泽东又指示刘、邓故作疑兵之态:“刘、邓于

10月20日率指挥机关从南京出发,沿津浦线北上,经徐州转往陇海线,于10月23日到达郑州,故意让刘伯承在公开集会上讲话,使国民党当局误判刘、邓二野将开赴西安一线,与贺龙的第十八兵团会师后,从北向南进攻秦岭、大巴山防线,从而将国民党军的注意力引向川北,使蒋介石作出了“拒共军于川境以外,以陇南、陕南为决战战场”^[3]的部署。

另一方面,毛泽东则精心指挥四野、二野等部队用大迂回、大包围的战略,对广西与西南的国民党军部署了两层大包围圈:首先他指示林彪的四野与陈赓的二野第四兵团在占领广州后,即从两广最南端向滇南进军,断敌退往海南岛与国外之路,全面包抄与围歼广西和西南地区国民党各军。1949年7月16日毛泽东致电四野、二野,指示作战战略时说:“无论在何处作战,均不要采取近距离包围迂回方法,而应采取远距离包围迂回方法,方能掌握主动,即完全不理白(崇禧)部的临时部署,而远远地超过他,占领他的后方,迫其最后不得不和我作战。”这是第一层大包围圈。在这封电报中,毛泽东又具体部署刘伯承、邓小平的二野迅即从华东战场调往湘、鄂西,准备从东、南面攻入四川,与川北的贺龙部第十八兵团配合,形成对四川国民党军的第二重包围^[1]。

在毛泽东与中共最高层在1949年把战略重点主要放在大西南地区时,也在筹划渡海攻占台湾。早在1948年年底国共两军在徐州、蚌埠间进行淮海会战时,中共最高层就筹组了未来接管台湾的省、市、县与部、厅、局等各级的主管与领导人选。据当时在中共华东局任要职的王力回忆说:“许多人还不知道,1948年准备解放台湾时,舒同是中央和华东局内定的台湾省委第一任书记。舒同为书记,刘格平为副书记,省委、省政府各部、厅、各地委、各县委的班子都已经组建和培训得很好。”^[4]在情报和策反上,中共中央与华东局也早就作了布置。早在抗战胜利后,中共情报部门就派遣曾参加过红军长征的台湾籍高级干部蔡孝乾及张志忠等人先后潜入台湾,组织“中共台湾省工作委员会”,积极发展组织与情报活动。1949年年初,中共情报机关又先后派遣在国民党军中任要职的吴石、陈宝仓等随军撤往台湾,吴石官至中将参谋次长,陈宝仓任国防部中将高级参谋,开展情报与策反工作。1949年10月金门战役后,中共华东局派女情报人员朱枫利用关系进入台湾,与中共台湾工委及吴石等人联系,为中共向台澎进军作准备^[5]。

在军事上,毛泽东与中共最高层在解放军渡过长江后,也开始部署攻略台湾的准备工作。1949年6月21日,毛泽东致华东局与华东野战军领导人粟

裕等人,明确指出华东野战军在“目前几个月内有四件大工作”。其中,第四件大工作就是“准备占领台湾”^[1]。就在6月21日这天,中共另一重要领导人刘少奇奉毛泽东指示,赴苏联进行秘密访问,其重要目的之一,就是请求苏联帮助中共培训空、海军人员和提供作战飞机、舰艇以及技术设备等,甚至试着提出请求苏联直接出动空军、海军,援助中共在1950年进攻台湾。1949年7月25日,毛泽东致电在莫斯科的刘少奇,指示刘与斯大林协商,请求苏方“在莫斯科于半年或一年内训练一千名空军人员,三百名地上机械人员,并卖给我们一百至二百架战斗机、四十架轰炸机作为明年(按指1950年)下半年我军进攻台湾之用。”^[6]斯大林爽快地答应了中共的请求。

总之,1949年毛泽东在战略上,主要是解决西南;对攻略台湾,只是在进行准备,并不打算在当年实施,而要等到1950年下半年才准备实施。这首先是因为毛泽东急于统一中国,对西南地区的重视超过了台湾,把1949年的战略重点放在了西南战线,甚至把在华东战场的“二野”全部调往西南,这样就必然无足够的力量同时攻略台湾;其次是毛泽东寄希望于得到苏联的军事援助,在等待中共海、空军的建立与发展。他没有想到世事难测,世界形势瞬息万变,机不可失,时不再来,1949年放弃的机会到1950年将再难以寻找回来。他注重西南地区的军事价值,却忽视了台湾地区对中国统一有着更为重要的意义。即使西南地区让国民党军再固守一段时间,一年两年甚至三年,也不会持久,中共军队随时都会攻克这一地区,而台湾如不及时攻取,则将“后患”无穷。

二

在中共军队挥师南下、占领了大陆大部分地区,国民党实际控制区只剩下台湾、海南等岛屿和西南地区时,国民党最高层与蒋介石的军事战略计划与措施恰恰同中共最高层与毛泽东相反。他们注重在台湾,而实际看轻西南。

早在1948年底、1949年初,国民党上层曾对国民党与国民政府的党、政、军、财、文中心撤往何方,进行过一场争论。许多高层人士凭抗战时西撤的经验,主张撤往大西南、大西北,利用中国西高东低的地理特点,取居高临下防守之势,负隅顽抗。这样虽说防备中共方面进攻的难度较大,可却有偷袭中原、重占东南之便。但反对西撤的人认为,今日的形势与抗战初绝不相同,解放军兵力充足,攻势正盛,地形熟悉,且与民众联系较紧密,远非当年兵力不足、地形民情不熟的日本侵略军相比,因而国民党军若再故伎重演撤往大西南,则将无论怎样都不能阻挡

中共军队的凌厉攻势,将陷于全军覆没的绝境。历史地理学家张其昀等向蒋介石说明东撤台湾的种种优势:首先,是台湾海峡海阔浪高,只有它才能暂时阻止没有海、空军优势的中共军队的胜利追击,使兵败溃退的国民党军队能有效地躲避解放军不可阻挡的攻势。其次,台湾作为“反共救国的复兴基地”,有着在大陆任何地区都无法比拟的优越之处:其一,台湾地处中国东南部,热带和亚热带的气候适合动植物的生长,物产丰富,土地利用率高,植被茂密,粮食等农产品基本可满足军民所需;其二,台湾岛内部交通便利,工业有日据时代留下的基础,若善于经营,经济可望起飞;其三,在军事上,台湾岛有海峡与大陆相隔,易于防守;且位于大西洋西缘,扼太平洋西航道之中,与美国的远东防线衔接,战略地位极为重要,美国不会弃之不顾,若得美援,台湾防守将万无一失;其四,台湾居民在日本殖民统治下生活了50年,回到祖国怀抱后对中央政权有一种回归感,这种心理正可利用来稳定社会秩序。尤其是中共组织与人员活动较少,又经1947年“二二八”事件整肃,干扰更少,未来即使社会稍有动荡,台岛四面皆海洋,呈封闭形,境内铁路、公路四通八达,农村都已开发,政府极易镇压不稳定因素。因此国民党若将党、政、军、财、文中心迁台,再带来较多的资金与较多的人才,必将建成稳固、强盛的台湾基地,适当时就可反攻大陆^[7]。

蒋介石毕竟有多年的军政经验,因此很快就否决了西撤论,接受了张其昀的建策,在1949年初作出决策,将国民党的党、政、军、财、文的中心东撤台湾。

蒋介石与国民党最高层为实施上述战略决策进行了一系列颇有成效的工作。早在1948年12月24日,蒋介石任命最忠诚、干练的陈诚为台湾省政府主席,不久又任命他兼任台湾省警备总司令。12月29日任命蒋经国为国民党台湾省党部主任委员,协助陈诚总揽台湾党、政、军大权。这是国民党最高层为退守台湾所作的重要人事安排。1949年1月10日,蒋介石命蒋经国赴上海会见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让俞将库存黄金、白银与外汇秘密运往台湾,共值3亿7千多万美元^[8]。接着又将从北平、南京运出的文物5000多箱,分3批运往台湾。1949年3月12日《中央日报》也迁至台北出版。1949年4月底中共军队渡过长江后,蒋介石于5月迁居台湾,6月在台北设立总裁办公室,下设八组及一个设计委员会,成为实际上的国民党最高领导核心。在此前后,蒋介石对台湾本土及外围各海岛乃至福建省重要地域的军事防卫作了重要部署,实施一系列政治、经济、军事、治安、党务等方面的整顿与改革措施,大力破

获中共地下组织与反叛人员。

当然,蒋介石与国民党最高层在重点经营台湾地区的同时,对西南地区并未立即放弃。在1949年8月29日,蒋介石到重庆主持召开西南军事会议,提出与制订了确保大西南的方针与计划,其主要内容是:以四川为西南防御重点,西起岷山,经秦岭、大巴山、巫山和武陵山,南至五岭山西部,构成所谓“西南防线”。蒋介石命胡宗南、罗广文、孙元良、宋希濂等分段防守四川的北部与东部,往南与白崇禧等部防守的贵州、广西联成一气。在1949年10月中旬广州失守前后,国民党中央党部、行政院等机构迁往重庆,新任行政院长阎锡山等党国要人也随之驻守重庆,并在报刊与社会上大造“防守大西南”的舆论,给世人以“迁都重庆,割据西南”的印象,借此将中共的主要注意力与战略重心引向西南。

但实际上,蒋介石部署“西南防线”,既信心不足,投入力量更不足,充其量仅仅把此战线作为国民党军的一个“偏师”。1949年8月底,胡宗南、宋希濂等将领在重庆晋见蒋介石,要求蒋常驻重庆或成都指挥西南军事,蒋托辞婉拒,以情势有所不便,只好婉言劝慰,告以不能久居。^[9]可见蒋并不把他的“基地”与战略重点放在西南。

三

在国共双方最高层制定的军事战略方针指导下,在1949年底,国共的内战在东、西两条战线出现了不同的战争结果。

在两广与西南战线,中共的大迂回、大包围战略取得了重大胜利。

先是解放军四野林彪部在1949年7月起对湖南发动强大攻势,迫使白崇禧部退往湖南南部,9、10月间,四野在衡(阳)宝(庆)战役中消灭白崇禧部主力一部,于10月14日占领广州;11月初,四野和四兵团分三路向广西进军,将白崇禧部围歼于广西。接着,陈赓部从桂南百色迅速插入滇南,断绝西南国民党军往国外的退路,实现了对西南地区的第一层大包围。

1949年10月下旬,刘伯承、邓小平率领二野主力秘密进驻湘西、鄂西地区,11月1日,突然从湘西、鄂西向黔东、川东发动猛烈进攻,拦腰截断了国民党军的西南防线。其中二野五兵团杨勇部由湖南芷江出贵州,占领贵阳、遵义后即分路向川南突击,到12月20日,先后占领泸州、宜宾、乐山、邛崃、大邑等城。二野三兵团陈锡联部从湘、鄂、川边突入,于11月30日占领重庆,接着向西进击;此时,在四川北面的贺龙部第十八兵团也越过秦岭、大巴山一

线猛扑成都。这样,解放军就从南面、西面、北面包围了以成都为中心的川西平原,包围了国民党在大陆的最后一个军事集团——胡宗南军事集团及其他国民党部队。这可以说是解放军对西南地区的国民党军实施的第二层包围圈。

胡宗南部身陷两重包围圈中。胡宗南深知成都平原地区非战守之地,故多次向蒋介石要求迅速率军退向康、滇地区,但蒋介石不允许。蒋希望以胡宗南部为骨干,联合西南地方实力派刘文辉、卢汉等部,在西南坚守,与东南的台湾呼应。这不仅在军事上有重要的意义,而且在政治、外交上更有重要意义。为此,蒋介石通过行政院,于1949年12月8日宣布改组西南军政长官公署,由参谋总长顾祝同兼任西南军政长官,胡宗南任西南军政副长官代行长官职务,统揽西南军政。蒋介石要胡宗南率部与中共解放军在成都地区进行决战。但形势的迅速发展打破了蒋介石的设想。在成都地区的20多万国民党军队在胡宗南的指挥下,既未能及时、果断地西撤康、滇,又未能认真部署成都防守,北未能扼守剑门天险,南未能控制乐山通道,东不能阻止解放军攻势,西又不能击破刘文辉等叛军,犹豫彷徨,很快陷入解放军与反叛部队的东西夹击与四面合围之中,最终全军覆没。

胡宗南部在成都战役中的惨败除政治、经济等方面原因外,在军事战略指挥上,中共最高层的大迂回大包围战略决策及其成功实施,无疑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而在国民党方面,蒋介石主观错误的战略指挥则要承担第一位的责任。

四

成都战役与西南战线诸战役的结果使国民党军在西南战线彻底失败、全军覆没。它也使国民党政府在大陆的最后一块控制地区丧失。这次战役对国民党方面的负面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但是许多史学家却忽视了这次成都战役以及西南战线诸战役对国民党方面还有着正面的影响与作用,即它吸引了中共最高层在1949年战略决策时,把主要的注意力与战略重点放到了西南地区,吸引了中共二野全军与四野、一野一部都投入到西南战场与成都等战役中,从而削弱了中共在华东战场的兵力,减轻了对台湾与沿海诸岛的军事压力。

在1949年国民党政府从大陆溃退向台湾时,台湾的形势是极其严峻的。经济方面,设备破损,资金不足,技术人员缺乏,物资匮乏,人口激增,日用消费品奇缺,物价飞涨;政治方面,党政派系林立,矛盾尖锐,“事权难以统一”;“谣诼纷传,人心惶惑”,军事方

面,从大陆败退到台湾地区的国民党军队有60万,但“虚张声势有余,英勇拒敌不足”,多为败兵残卒,编制混乱,士气低落,其中空军8.5万人,各型飞机400架,但缺乏维修零件,真正能作战的仅有半数,汽油储存量约两个月,海军官兵3.5万人,舰艇约为59艘,和空军面临相同的困难。《新闻周刊》的军事评论指出:“实际发挥战力的海军攻击舰艇,不及半数。如果双方胶着,长期消耗,连这最后的本线,也将输光。”^⑩1950年1月5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关于台湾的声明,宣布“美国政府不拟遵循任何足以把美卷入中国内争中的途径……美国政府也不拟对在台湾的中国军队供给军事援助或提供意见。”^⑪在这期间,美国中止了对台湾当局的军事援助。美国政府很长时间没有向台湾派驻正式外交机构与代表。用旅美作家江南的话来说,在这时期的台湾,“用‘山雨欲来风满楼’来形容……其真实性无可非议。台湾前途,一片漆黑,除了向神祈祷,或许会出现扭转命运的奇迹。”^⑩更为致命的是,在1948年到1949年,中共方面的台湾工委,发展组织,积极活动,担任参谋次长要职的吴石等人秘密为中共做内应。显然,这是中共进攻台湾的最有利时机。

如果中共最高层在1949年作战略决策时,不把战略重点放到西南,只派四野、一野的部队对西南采取监视,既可牵制国民党的许多军力、财力,使其心存幻想,又不妨碍在不久的将来挥师西进、聚而歼之,而将战略重点放在东南,放在攻略台湾与沿海诸岛上,虽然这时中共还没有建立起强大的海、空军,但毕竟已经有一些从国民党军缴获及起义的海军舰艇与飞机,有了刚刚建立的一些海军与空军,再加上中共军队惯用的、曾在渡江与渡海攻占海南岛中获得成功的木帆船,集中绝对优势的兵力,利用天时地利,选择战机,逐岛进攻,则可能最终登陆台湾岛。中共军队不管用何种方式在台湾岛登陆成功,则台湾岛势将不保。

然而,毛泽东在1949年作战略决策时,把战略重点放到西南战线,在1949年9~10月,把华东战场上刘伯承、邓小平指挥的二野大军全部调向西南,从而使华东战场上兵力急剧减少。留驻华东战场广大地区的只有陈毅、粟裕指挥的三野部队,其中第八兵团4个军镇守南京、镇江和苏南、皖南一线;第七兵团4个军守备浙江,备攻舟山;第九兵团4个军守备上海一线;只有第十兵团的3个军:第28军、第29军、第31军,由十兵团司令员叶飞率领进入福建,在攻略与驻守福建城乡各地后,能承担攻略沿海岛屿的部队已为数很少。中共三野的军事指挥员粟裕等与军事指挥机关都未进入福建。就在这样的情况

下 ,入闽中共部队在 1949 年 10 月 25 日仅派 4 个团约 1 万人的兵力就发起进攻金门之役 ,且叶飞与军、师级长官多未亲临前线指挥 ,对渡海船只等多方面准备不足 ,因而遭致失败。11 月 6 日 ,中共驻浙江部队又轻率发起对登步岛的进攻 ,也遭致失败。

金门、登步之战鼓舞了国民党军衰败、低沉的士气 ,也稳定了国民党在台湾的形势。而中共最高层在遭受这两次失败后 ,对渡海作战攻略台湾更为谨慎。毛泽东为实施 1950 年夏“ 解放台湾 ”的战略计划 ,在 1949 年年底亲自率团访问苏联 ,向斯大林寻求进攻台湾的军事援助 ,特别是海军、空军援助。但为时已晚 ,进攻台湾的最好时机已经过去。台湾本土的政治、经济、军事、治安等形势到 1950 年开始稳定与好转 ,中共在台的地下组织在 1950 年初被彻底破坏 ,吴石等被捕杀 ,而朝鲜半岛的形势日益紧张 ,1950 年 6 月 25 日朝鲜战争终于爆发 ,6 月 27 日美国政府在宣布出兵干预朝鲜局势的同时 ,又发表声明称 :“ 共产党的军队占领台湾 ,将直接威胁太平洋地区的安全 ,并威胁到在该地区履行合法而必要之行动的美国部队。”美国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 ,“ 阻止对台湾的任何进攻。”^[12]

毛泽东生前曾对 1949 年中共的军事战略决策及其成败得失 ,作过一番总结与检讨。据王力在 1995 年回忆说 :“ 台湾为什么没能解放 ? 毛泽东同我讲过 ,这是我党‘ 七大 ’后所犯的第一个大的历史错误。当时 ,蒋介石在台湾立足未稳 ,美国人也从台湾撤走了第七舰队 ,本来是解放台湾的最好时机 ,但是我们丧失了时机。我们只看到胡宗南在西南还有大军 ,于是二野分兵去了西南 ,三野又要守备大城市和扫清残敌 ,所以没有把二野、三野集中起来解放台

湾 ,而是以劣势兵力在金门打了败仗。这样蒋介石在台湾的棋下活了。在大陆 ,蒋介石输了 ,我们赢了 ;在台湾 ,我们输了 ,蒋介石赢了。这是一个大的历史错误 ,是不能挽回的错误。”^[4]毛泽东的这番话 ,无疑是对 1949 年国、共军事战略及其得失的简要而深刻的论述。

参考文献 :

[1]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 1993. 506—507 , 530—531 , 519 .
[2] 郑维山 . 从华北到西北 [M]. 北京 :解放军出版社 ,1985. 338 .
[3] 刘宗宽 . 我在国民党西南军政长官公署的工作和见闻 [A]. 重庆文史资料选辑 15 [C]. 重庆 :重庆出版社 ,1991. 109 .
[4] 王力 . 漫谈舒同 [J]. 传记文学 ,1995 (12) :57—61 .
[5] 陈修良回忆录 [M]. 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9. 381—392 .
[6] 转引自刘少奇传(下卷) [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 1998. 651 .
[7] 吴相湘 . 民国百人传(第 4 册) [M]. 台北 :传记文学出版社 ,1971. 168 .
[8] 程思远 . 李宗仁先生晚年 [M]. 北京 :中国文史资料出版社 ,1985. 32 .
[9] 蒋经国 . 危急存亡之秋——1949 年 8 月 29 日日记 [M]. 台北 :中正书局 ,1976. 136 .
[10] 江南 . 蒋经国传 [M]. 纽约 :美国论坛报出版社 ,1984. 178 ,196 .
[11] 张山克 . 台湾问题大事记 [M]. 北京 :华文出版社 ,1988. 32 .
[12] 中美关系(文件和资料选编) [C]. 北京 :人民出版社 , 1971. 235 .

· 简讯 ·

索丽生副部长在河海大学作学术报告

5 月 23 日水利部副部长、河海大学博士生导师索丽生教授在河海大学举行的博导讲座上 ,作了题为《水利水电建设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学术报告。水利水电建设与生态环境保护的矛盾是当前的热门话题之一。索丽生副部长从中国的水资源特点与水利工程建设、能源概况与水电建设、机遇与约束三方面阐述了我国水利水电工程建设的前景 ,认为今后 15 ~ 20 年是水利水电建设的良好机遇期 ,这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要求 ,但生态保护将成为水利水电工程建设的重要制约因素。他就水利水电工程对生态与环境的积极作用和负面影响作了分析 ,认为应通过减少干扰破坏、逐步修复改善、加强节约保护等措施来寻求经济发达、社会进步、资源节约、生态良好、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可持续的平衡状态 ,不可能也没必要返回历史记录中的“ 自然生态 ”。他提出了坚持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做好战略规划 ,以人为本、做好移民安置工作 ,开拓创新、改进工程规划设计运行管理等克服和减少负面影响的措施。他还对当前学术界争议及社会关注的几个热点问题如美国是否在拆除大坝、中国水库大坝的拆(废)除情况、怒江开发与保护、淮河水污染防治等问题进行了详尽的分析和说明。

(本刊编辑部供稿)